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丁玲的最後生涯
(1949 — 1986)

秦林芳◆著

文藝與
政治的歧途

丁玲的最後生涯
(1949 — 1986)

秦林芳◆著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丁玲的最後生涯 (1949-

1986)/ 秦林芳著. -- 一版. --臺北市：

秀威資訊科技，2008.03

面；公分. —(史地傳記類；AC0006)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6732-80-5 (平裝)

1.丁玲 2.傳記

782.886

97001869



史地傳記類 AC0006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丁玲的最後生涯（1949-1986）

作 者 / 秦林芳

發行人 / 宋政坤

主 編 / 蔡登山

執行編輯 / 賴敬暉

圖文排版 / 黃莉珊

封面設計 / 蔣緒慧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8 年 3 月 BOD 一版

定價：44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8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目録

第一章	從兩種傳統中走來	1
第一節	走向「革命」	1
第二節	「自由」的潛流	21
第二章	做好一名小號兵——跨進新的時代來（一）	37
第一節	跨進新體制	37
第二節	主編《文藝報》	51
第三節	主持中央文學研究所	69
第四節	小號兵的聲音	83
第三章	要看見旁人看不到的東西——跨進新的時代（二） ...	101
第一節	歷史地對待歷史	101
第二節	一本書主義	111
第三節	戰勝教條主義	126
第四章	風暴襲來	139
第一節	風暴初起	139
第二節	辯正與抗爭	150
第三節	反右與再批判	161
第五章	風雪人間	181
第一節	到北大荒去及其前後	181
第二節	苦難的歷程	191
第三節	個性・信念・情感	204
第四節	逆境中的慣性	219

第六章	自由的呼喚	235
第一節	平反之路	235
第二節	韋護精神	252
第三節	《「牛棚」小品》與其他	264
第七章	政治的夢魘	287
第一節	固著的政治情結	287
第二節	《杜晚香》內外	302
第三節	遙遠的回聲	311
第四節	訪美之行	326
第五節	文人相輕的背後	338
尾 聲		361
主要參考文獻		363

第一章 從兩種傳統中走來

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過了那麼久，卻還不能徹底地變更自己，他那種二重的生活使他在臨死時還不能免於有所申訴。我常常責怪他申訴的「多餘」，然而當我去體味他內心的戰鬥歷史時，卻也不能不感動，哪怕那在整體中，是很渺小的。¹

——丁 玲

第一節 走向「革命」

丁玲（1904-1986），原名蔣冰之，湖南臨澧人。她是在思想和文學上帶著深厚的積累和深刻的矛盾向共和國走來的。作為一名出道較早的資深作家，她邁進共和國門檻時才 45 歲，但她卻經歷過新文學史上幾個重要的文學階段。總的來說，其創作軌跡的演變與新文學主潮的流向相一致，都經歷了從「五四」走向「革命」的過程。

丁玲最初是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1946 年 5 月，她在為《時代青年》而寫的一篇文章中說：「我雖沒有參加到『五四』，沒趕得上，但『五四』運動卻影響了我，我在『五四』浪潮極後邊，它震動了我，把我帶向前邊。」²「五四」運動爆發的那年，她在湖南桃源、長沙等地求學。她不但積極參加了遊行、講演、剪辮子等學生運動，而且在思想上受到了極大震動：「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

¹ 丁玲：〈風雨中憶蕭紅〉，《丁玲全集》第 5 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5 頁。以下所引《丁玲全集》各卷，版本均同此，不再另注。

² 丁玲：〈我怎樣飛向了自由的天地〉，《丁玲全集》第 5 卷，第 265 頁

要科學、要民主、要自由、要解放的呼聲和潮流，猛烈地激盪著我們，使我們如饑似渴地去找北京和上海出版的各種報章雜誌來讀，想從裏面找到中國應該走的道路」³。丁玲後於 1922 年入上海平民女子學校，1923 年就學於上海大學中文系，1924 年到北京。在這段時間裏，丁玲受「五四」新思潮影響，熱心向西方學習。其影響所及，不僅在她的文學創作，更在她的思想。這正如她事後所說：「如果沒有西方文學對我的影響，我大概不會寫小說，至少不會寫像這個譯本中的小說。可以看出，我最早的小說是跟著西方現實主義的道路走的，不只在形式上是如此，就是思想上，也是受了一些西方民主主義的影響。」⁴

在「五四」思潮和西方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下，丁玲「滿帶著『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⁵而登上文壇，在大革命失敗後的苦悶中開始了小說創作。1927 年 12 月和 1928 年 2 月在《小說月報》發表處女作〈夢珂〉和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至 1929 年上半年又作小說 10 餘篇，主要收入《在黑暗中》（1928 年）、《自殺日記》（1929 年）、《一個女人》（1930 年）等三個集子中。此時，中國革命已越過思想革命時期，而進入了實際的社會革命階段，但她的創作卻仍然探討著五四時期的思想革命和個性解放的命題，關注著知識女性在五四退潮期的境遇與命運，表現了由個性解放幻滅導致的沈深的精神苦悶。此期，新文學第一代女作家冰心、廬隱等在思想和創作上處在相對停滯狀態，丁玲卻以新銳的朝氣和勇氣寫出了現代女性的心理與情感。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她描寫女性生活的〈夢珂〉、

³ 丁玲：〈解答三個問題〉，《丁玲全集》第 8 卷，第 52 頁。

⁴ 丁玲：〈為英文版《丁玲短篇小說選》寫的前言〉，《丁玲全集》第 9 卷，第 215 頁。

⁵ 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藝月報》第 1 卷第 2 期，1933 年 7 月。

〈莎菲女士的日記〉、〈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等連續在《小說月報》刊載，確實給 20 年代末的文壇以不小的震動。

關於她此期的創作動機，她稍後（1932 年、1933 年）有過這樣的說明：「在開始，……對於社會上的一切，或某一件事，有一個意見，就想寫出來發表給大眾……同時我當初並不是以批判的觀點寫，只是內心有一個衝動，一種願望，想寫出怎樣一篇東西而已」，在兩三年時間裏，她的創作忠實於內心的感受、衝動，「總是先寫一個頭，擱下，後來再受了感觸，覺得非寫不可，於是再寫下去」⁶；「我那時為什麼寫小說，我以為是因為寂寞，對社會不滿，自己生活無出路，有許多話需要說出來，卻找不到人聽，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機會，於是便提起了筆，要代替自己給這社會一個分析。因為我那時是一個很會發牢騷的人，所以《在黑暗中》，不覺的染上一層感傷。社會的一面是寫出了，卻看不到應有的出路。」⁷這些話道出了丁玲早期創作基本的情思特色。處女作〈夢珂〉寫一個出生於破落封建家庭的女子走出家庭、闖入社會後陷入困境的故事。女主人公本為一正直、善良、有同情心的女孩，但在學校和社會上與一些卑鄙之人接觸後，她發現了人心的險惡。於是，她慚慚地變了，為了能生存下去，她也不再反抗了：「以後，依樣是隱忍的，繼續到這純肉感的社會裏去，那奇怪的情景，見慣了，慢慢的可以不怕，可以從容，使她的隱忍力更加強烈，更加偉大，能使她忍受非常無禮的侮辱了。」小說承續五四浪漫抒情小說傳統，以鮮明的女性意識真實地寫出了社會吞噬一位曾經對生活抱有理想的純真女孩的過程，表述了現代女性在 20 年代後期的社會人生感受。

⁶ 丁玲：〈我的創作經驗〉，《丁玲全集》第 7 卷，第 11 頁。

⁷ 丁玲：〈我的創作生活〉，《丁玲全集》第 7 卷，第 15-16 頁。

沿著〈夢珂〉的情思軌跡，〈莎菲女士的日記〉對現代女性的人生困境和心理矛盾作出了更加深刻的開掘，它也因此成為早期同類作品的代表作。主人公莎菲的形象是丁玲早期作品所塑造的叛逆、苦悶的青年知識女性形象系列中最成功、最突出的一個典型。莎菲在五四個性主義浪潮的衝擊下背叛封建禮教，大膽走出家門，對個性解放有著無限的憧憬和追求。她渴望純真的愛情，要求「享有我生的一切」。但是，她所處的畢竟不是五四時代了，在大革命失敗後的低氣壓下，社會不會任其取用來滿足她的欲望，她對人生意義的執著尋求只能導致幻滅。在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的情況下，她卻又不願意放棄反抗和追求，於是，這種痛苦的掙扎便不免帶上濃重的悲愴情調和病態色彩。她也因此成了「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⁸。作品以大膽直率的描寫，通過對她在愛情追求上的複雜矛盾的心理和行為，展示了她的叛逆、病態的性格：一方面，她欣賞葦弟的善良忠厚，又不滿於他性格的平庸怯懦；另一方面，她傾慕南洋閩少凌吉士的漂亮儀表和高雅風度，又鄙視他市儈主義的卑劣靈魂。在兩個男性中，她沒有選擇前者，也沒有選擇後者——但她在發現其靈魂的庸俗齷齪後卻仍然接受了他的吻，而吻過之後又毅然離開了他。這裏有她對靈（即自我個性）的堅守，也有靈肉分離後對肉（即性愛）的追求；但性愛的誘惑最終卻沒有使之泯滅靈的光輝。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後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愛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⁹。作品著重刻畫的是莎菲在愛情上的矛盾心理，但這一心理卻反映出了時代投射在一部分知識女性身上的陰影，作者所說的「給這社會一個分析」就是從這一特定角度出發的。莎菲的矛盾和苦悶，是經歷過五四個

⁸ 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藝月報》第1卷第2期，1933年7月。

⁹ 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藝月報》第1卷第2期，1933年7月。

性主義思想洗禮的覺醒青年在時代低壓下陷入彷徨狀態的真實寫照，因而折射出了深廣的社會歷史內容。莎菲對愛情追求的失落流露出來的是對整個社會的絕望的情緒。在她看來，「在這個社會裏面是不會准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來滿足我的衝動，我的欲望」，於是，她便以變態、自戕的生活方式表示自己與社會的對立和對社會的反抗，「悄悄的活下來，悄悄的死去」。小說以第一人稱日記體的形式，飽含感情地對女主人公的內心世界作了深入細膩的揭示，顯示出了作者擅長描寫人物心理的出色才能。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記〉為代表的早期作品，以書寫女性命運為中心，重視心理描寫和情感抒發，顯然受到了法國現實主義文學（尤其是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一生》等作品）對於現代社會虛偽文明的批判、對女性命運深切關注、對於愛瑪式女子的描寫以及心理剖析技巧的啟發，也受到了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感傷型浪漫主義抒情風格的影響。而從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的源流上來看，這些作品也是對由郁達夫開創的以《沈淪》為代表的「五四」個性主義浪漫感傷小說的繼承、回應與總結。

忠實於自己內心感受的創作動機和創作實踐表明了丁玲此期對「五四」自由思想和「五四」文學個性精神的追慕。或者說，其精神基礎就是崇尚個體尊嚴與自由的「五四」個性主義思想。晚年的丁玲在回顧自己的生活和思想道路時，清醒地意識到了「自由」與「革命」的矛盾，並承認自己在走向革命前的那一段時間裏對「自由」曾有過那樣深情的憧憬和深切的迷戀：

我原是一個貧窮的孤女……封建的黑暗生活常常要烙著我。我又讀過一些古書，熟悉一些古人。因此忠烈愛國、慷慨激昂，孤高自賞，感傷憂鬱各種矛盾注滿我的心靈。有許多是

催使我走向革命，然而又有許多是不合乎革命所須要的。比如自由。我個人一直是認為要自由思想，自由行動。「我怎樣飛向了自由天地？」……當我在平民女校時，有人徵求過我的意見入團，在上大也有人徵求過我的意見入團。我都表示了我的意見：我怕不自由。而當有人說：「你就按你喜歡的去學、去幹、去飛吧，飛得越高越好，越遠越好，你是一個須要展翅高飛的鳥兒。」我引為知己，並且就照著這樣辦，衝擊了幾年……¹⁰

這裏說的「有人」指的是瞿秋白。瞿秋白對她和社會有相當深刻的「理解」，當她向他徵求意見時，他說：「你嘛，飛得越高越好，越遠越好。」瞿秋白的話正中了她的下懷，她把他引為知己，因為她當時不想要的「就是黨組織的鐵的紀律」，她甚至把它比作是「一個緊箍咒」。她覺得「要服從鐵的紀律，命令我幹一件事，就非幹不可，要我去做機器裏面的一顆螺絲釘，放到哪裡就在哪裡，我心裏自問，這個太不自由，這個不行」。於是，她拿起了筆，雖然「拿筆也不一定行，但我可以自由」¹¹。因此，她早年拿筆寫作本身，就構成其思想和生活態度的一種象徵：她渴望「自由」，渴望「自由」地發抒，渴望在「自由天地」裏展翅翱翔。而事實上，她早期以〈莎菲女士的日記〉為代表的創作確實也抒發出了對個性「自由」的追求和這種追求不能實現的憤懣。

1929年下半年至1933年5月被捕前，丁玲的思想和創作開始發生變化。她邁出了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在創作上看，其早期小說中的個性主義主題開始為集體主義主題所替代，這很有代表性

¹⁰ 丁玲：〈隨感四則（四）〉，《丁玲全集》第9卷，第436頁。

¹¹ 丁玲：〈我是人民的兒女〉，《丁玲全集》第8卷，第306、307頁。

地表現了 20、30 年代之交中國現代文學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轉型。她力圖拓寬視野，突破自身情緒宣泄的局限，創作了以革命者為主人公的長篇小說〈韋護〉。作品以「五卅」運動前的社會現實為背景，描寫了小資產階級女性麗嘉與革命者韋護的戀愛與衝突。韋護曾為愛人麗嘉而忽略革命工作，後在同志的「幫助」與粗暴的干預下，他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便離開深愛著他的麗嘉，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業中了。小說試圖表現革命者對個性主義與集體主義矛盾的超越，韋護的形象對於人們瞭解此期共產黨人的生活，也有相當的認識價值。但是，由於丁玲對革命者的生活並無深刻的瞭解，致使韋護的形象不夠豐滿，並且故事本身也是「庸俗」的，竟「陷入戀愛與革命衝突的光赤式的陷阱裏去了」¹²。之後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在描寫知識份子從個人主義走向集體主義的道路時也帶有這樣的痕跡，雖然這些作品中的幾位女性形象還顯得較有光彩。總之，此期丁玲處在轉換途中，其思想急劇左轉，其「向外轉」的創作在隨之強化社會性和革命性的同時，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忽略了藝術的獨創性。這也顯示了早期革命小說的一般的特點和缺點。

1931 年秋，丁玲在《北斗》雜誌上發表了短篇小說〈水〉。它以當年發生的十六省大水災為題材，描寫了農民與水災和官府作殊死搏鬥的情景，場面壯闊，筆觸粗獷，凸現了覺醒、抗爭的農民群像，顯示了「作者對於階級鬥爭的正確的堅定的理解」¹³。作品發表後得到左翼理論家的熱情肯定，被視為左翼所倡導的「新小說」的萌芽。茅盾指出，〈水〉的發表，「不論在丁玲個人，或者文壇全

¹² 丁玲：〈我的創作生活〉，《丁玲全集》第 7 卷，第 16 頁。

¹³ 馮雪峰：〈關於新的小說的誕生——評丁玲的「水」〉，《北斗》第 2 卷第 1 期，1932 年。

體，這都表明了過去的『革命與戀愛』的公式已經被清算了」¹⁴。因此，〈水〉既標誌著丁玲創作的明顯轉變，也顯示了 30 年代整個革命文學的發展。之後，丁玲還沿著〈水〉的道路，寫出了一系列表現工農生活的作品，如〈消息〉、〈法網〉、〈奔〉、〈夜會〉等。

丁玲創作向「革命文學」的轉型，緣於其思想上的巨大變化，緣於其對「自由」與「革命」的新的理解。關於其文學創作路向發生變化的原因，她說過：「稍後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我的小說很自然地隨著中國人民和時代的要求而發生變化，其內容、人物和生活就都是中國式的了」¹⁵。她所說這些都是外部因素。當然，對她創作轉型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其思想的變化和主觀上對這些外部因素的體認。她思想的變化首先是在征服創作危機中發生的。應該看到，以〈莎菲女士的日記〉為代表的丁玲早期創作以其自我生活及其體驗所建立的「向內型」的藝術結構是封閉型的，因而不穩定的。特別是在特定的題材範圍內，她的創作起點便成了頂點的現象，作為一種壓力和動力，更迫使她去作新的藝術開拓，去顛覆其原有的藝術結構。馮雪峰曾經指出，〈莎菲女士的日記〉的作者和主人公「十分同感而且非常濃重地把自己的影子投入其中去」，「在這上面建立起自己的藝術的基礎」，她在藝術上取得了成功，但也使這個作品成了「一個不能再前進的頂點」，從而「面臨著一個危機了」。他分析說：「這危機可以有三種出路，一是照舊發展下去，依然和社會的前進革命的力量隔離著，寫些在戀愛圈子內的充滿著傷感、空虛、絕望的種種所謂灰色的遊戲的作品；但這些作品將越寫越無力，再寫無法寫出第二篇和〈莎菲女士的日記〉同樣有力的東西來，那也是一定的，在她以前或同時就有類似的例子了。二是，不能再寫了，

¹⁴ 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藝月報》第 1 卷第 2 期，1933 年 7 月。

¹⁵ 丁玲：〈為英文版「丁玲短篇小說選」寫的前言〉，《丁玲全集》第 9 卷，第 215 頁。

就是說擱筆了。三是，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並從而追求真正的時代前進的熱情和力量（人民大眾的革命力量）。這第三種是真的出路，並且也和已往的戀愛熱情的追求聯接得起來的，因為戀愛熱情的追求是被『五四』所解放的青年們的時代要求，它本身就有革命的意義，而從這要求跨到革命上去是十分自然，更十分正當的事。所以，這應當是一個轉機。」¹⁶確實，從 1929 年下半年開始，丁玲自己產生了拓展題材範圍、轉換創作路向的自覺要求。她曾借作品中人物——青年作家若泉之口說道：「對於我們的一些同行，我希望都能注意一點，變一點方向，雖說眼前難有希望產生成功的作品，不過或許有一點意義，在將來的文學歷史上。」正是在這種征服創作危機的內發要求驅使下，丁玲借鑒了當時流行的「革命小說」模式，以浪漫的情熱寫出了「向外轉」的〈韋護〉、〈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如馮雪峰所說的那樣，以追求戀愛的熱情去「追求真正的時代前進的熱情和力量」。由於丁玲對革命既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對實際的革命情形又缺乏真切的認識，所以，作品概念化痕迹相當濃重。這是丁玲為了征服危機、轉換路向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但是，丁玲在征服創作危機中發生的思想變化對她此後的創作道路還不具有決定性意義。儘管她此時在創作中表達了對革命的向往，但還僅僅停留在意識和情感層面，而沒有參加革命組織並投身到實際的革命運動中去。在許多正直的知識份子紛紛左傾，在道義和情感上對革命抱以理解、同情和向往的時代，丁玲作出如此舉動，是不難理解的。但是，在思想深處，丁玲那時仍然固執地認為「自己自由地寫作，比跑到一個集體裏面去，更好一些。我們並沒有想

¹⁶ 馮雪峰：〈《丁玲文集》後記〉，《馮雪峰選集·論文編》，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3-234 頁。

著要參加什麼，要回到上海。我們只是換了一個地方，仍然寂寞地在寫文章」¹⁷。雖然那時她不可能不受到革命氛圍和革命文學的影響，但她並沒有放棄「五四」思想自由的原則，她對革命的嚮往和描寫也是她自由思想和自主探索的結果。1930年5月，從濟南回到上海的丁玲和胡也頻經潘漢年介紹同時參加左聯。關於此事，丁玲回憶說：「5月從山東回來，和潘漢年聊了一陣天，喝了陣咖啡，就參加了左聯。但因有小孩，不願意活動。」¹⁸當時她參加左聯的方式既顯隨意，後又以懷孕為由不願意參加左聯活動，因此，其實際意義並不彰顯。

1931年2月胡也頻慘遭殺害，這一慘案使丁玲真正懂得了什麼是「專制」，什麼是「殘暴」。她感到了在專制的淫威中個體的渺小和無力，而開始真正寄希望於「大家」、「集體」。5月28日，她在中國公學發表講演，希望死人的意志化為「大家」的努力：「有人說：死去了一個朋友，彷彿丁玲應該努力；也有人對我有善意的勉勵。但死人的意志，只在一個人身上嗎？難道不在大家身上嗎？」¹⁹她個人當時也極力否定「丁玲終日以淚洗面，扶孤返湘」的孤苦，指出「這是錯誤的，是一種模糊的印象」²⁰。原因就在於她找到了集體，融入了集體。這給了她自信和力量。從那以後，左聯對她來說才真正具有了「集體」、「組織」的意義。胡也頻犧牲後不久，她即向左聯提出去蘇區工作的請求，9月，又根據黨組織的決定留滬編輯左聯機關刊物《北斗》。第二年3月，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宣誓儀式由潘梓年主持，瞿秋白代表上級黨組織參加。丁玲在儀式

¹⁷ 丁玲：〈我與雪峰의 交往〉，《丁玲全集》第6卷，第268頁。

¹⁸ 見王景山：〈我所知道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和所長丁玲〉「附錄一」，「我日記裏丁玲的幾次講話」。

¹⁹ 丁玲：〈死人的意志難道不在大家身上嗎？〉，《丁玲全集》第7卷，第6、7頁。

²⁰ 丁玲：〈我的自白〉，《丁玲全集》第7卷，第1頁。

上宣誓：「再也不做黨的同路人了。我願意做一顆螺絲釘，把我放在哪裡，我就在哪裡，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我的生命，我的心，不是屬於我自己的，而是屬於黨的。」²¹以此為標誌，丁玲在思想上急劇地完成了左轉，投身到了革命和集體的行列，渴望「自由」、尊崇個性的她皈依了「革命」，飛進了「集體」的懷抱。當年曾勸她「飛得越高越好，越遠越好」的瞿秋白如今又多了一個同志，真不知叫在場的他產生何種感慨！

丁玲的思想變化從征服創作危機開始，中經胡也頻犧牲的刺激，最後終於以自願放棄一己「自由」、投身「革命」而結束。在實現思想轉換的過程中，丁玲的文學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她將「作者的態度」和「階級的意識」放在創作的首要位置上，批評青年作者「站在旁觀的地位，在作品中說出作者自己的話」（亦即反對個性意識的流露和表現），強調文學「能夠組織起廣大的群眾」的「社會價值」，反對「胡秋原之流」所要求的「所謂文學的本身價值」²²。在題材上，號召「用大眾做主人」，要求作家「不要太喜歡寫一個動搖中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這些又追求又幻滅的無用的人，我們可以跨過前去，而不必關心他們，因為這是值不得在他們身上賣力的」；要求「已經有階級的覺悟」的青年作家「決心放棄眼前的，苟安的，委瑣的優越環境，穿起粗布衣，到廣大的工人、農人、士兵的隊伍裏去，為他們，同時就是為自己，大的自己的利益而作艱苦的鬥爭」，以「產生新感情和新意識」，獲得「實際生活」的題材²³。丁玲思想和文學觀的變化導致了其創作本身的轉向，創作出了「以大眾做主人」、具有鮮明階級意識的〈水〉、〈法網〉等作品。

²¹ 引自丁玲：〈我是人民的兒女〉，《丁玲全集》第8卷，第309頁。

²² 丁玲：〈我的創作經驗〉，《丁玲全集》第7卷，第12、13頁。

²³ 丁玲：〈對於創作上的幾條具體意見〉，《丁玲全集》第7卷，第9-10頁。

丁玲走向「革命」、皈依集體的思想轉換是在反抗暴政的過程中實現的，也是以放棄「個人自由」為前提的。丁玲的這種思想定勢在以後長期的生活和工作中一再表現出來。1933年5月，丁玲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在南京度過了三年多的幽囚歲月。1936年9月逃離南京，11月到達陝北。1937年8月至1938年底，出任西北戰地服務團（西戰團）主任，率團開赴抗日前線，從事抗日宣傳工作。在西戰團活動期間，丁玲也積極提倡「個人」服從「集體」、「自由」服從「紀律」。在〈西北戰地服務團成立之前〉一文所附的日記中，她寫道：「領導是集體的，不是個人的，所以不是一個兩個英雄能做成什麼大事的」；個人「要在群眾的監視之下糾正那致命的缺點」²⁴。在西戰團第一次大會討論通過的〈本團規約〉中頭兩條即為「一切行動聽指揮」、「對上級應有禮節」²⁵。在她看來，為了「革命」，犧牲個人自由是必要的。她在1938年夏作的一篇文章裏對此說得分明：「為了人類幸福的前途，是須要大多數人犧牲了個人自由，耐心的，誠懇的不被流俗所喝采，也不以困難委屈而氣餒的去工作，這些人也許不會出名，但他的偉大卻將因世界的進化而永存在人心中。」²⁶

不要以為丁玲對「集體」、「紀律」的鼓吹僅僅是一種理念上的倡導，它本身還成了約束人們行為的標準和尺度。1937年冬天，丁玲寫了一篇散文〈一次歡送會〉，生動地描寫了集體對一個「個人自由主義者」王淇的批評幫助及王淇的轉變過程，具體地展示了「集體」、「紀律」對個體的約束力。王淇讀過不少社會科學書籍，「同志們因為領導上對他頗為重視，也都希望他有一些好的表現」。但幾次

²⁴ 丁玲：〈西北戰地服務團成立之前〉，《丁玲全集》第5卷，第48頁。

²⁵ 丁玲：〈第一次大會〉，《丁玲全集》第5卷，第50頁。

²⁶ 丁玲：〈反與正〉，《丁玲全集》第7卷，第38頁。